

清代江南人口性别构成问题的考察

吴建华

一 关于宗谱人口性别构成资料

人口性别构成是人口研究的基础指标之一,它反映人口和社会、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

研究清代历史人口首先碰到官方人口资料的不足和人口统计的疏漏问题,因而对人口的性别构成难以深知。有感于此,笔者认为,现存丰富的宗谱是人口研究尤其是清代历史人口研究(公元1644~1911年)的资料宝库。对此大力开发,能够获得众多的人口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官方人口资料的不足,了解官方人口统计的精确性;进而探讨许多官方人口资料无法反映的人口现象,以便更全面地把握人口状况和人口发展的过程。

笔者曾经随机抽查了清代江南区域的数十部宗谱,对这些宗族人口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统计和研究,得出初步的结论^①。本文拟就清代江南人口性别构成问题作些探讨。

宗谱人口性别构成,即每个宗族出生的男性和女性人口在该宗族中所占的比例,可用每个宗族出生的男性人数对女性人数之比来表示。

然而,宗谱记载的男女性人口数量各有不同。究其原由主要有二:

(一)宗谱修纂时的重男轻女意识。有的宗族故意抹掉或不认真记载本族出生的女性人口。例如,江苏吴县东山严氏没有本族女性记载,这是祖宗成规,宗族成员久已习惯。每届修纂宗谱,族人不上报女性。后人意欲改变,却十分困难^②。这是宗谱中极端重男轻女的典型。有的宗族量力而行,对女性人口记录了一些,但也遗漏了不少。例如浙江海宁高氏女性人口只占该宗族总人口3.38%,显然不合实情。慈溪师桥沈氏占该宗族总人口7.96%、苏州葑门陆氏占10.02%、余姚茹墟徐氏占21.07%,令人难以置信。苏州平江叶氏从宗谱的11世开始才有女性出生人口记载,愈后愈多,且有“未适人”(即未出嫁)的数量统计,做得很细致。可是,11~23世的女性人口也不过是同期宗族人口的34.56%,性别比达189.37。

(二)修纂宗谱时因年久遗忘。修谱者尽了最大努力搜索本宗族出生的女性人口,无奈“修谱旷隔”、“阅时既久”,“迁徙舛舛必多势难查核”。^③一般讲,“三世不修谱,谓之不孝”^④。实际上,由于经费和人力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宗族子孙往往虽存孝心,无法及时续谱。男性人口尚可代代凭记忆作回溯性记载,而本族出生的女性人口则或外嫁、或未嫁先逝、或早殇、或远徙,疏漏难免。余姚茹墟徐氏光绪二十五年(1899)修谱已间隔百余年。海宁高氏祖训有子孙每“阅十年、二十年,时加排纂,俾无缺遗”^⑤,而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五修时距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四修宗谱已隔98年了。享誉“模范”宗谱的武进庄氏宗谱从1580~1935年凡七修,355年中连同草创宗谱平均44.38年修一次,17世男性人口卒年还多有阙略,其它宗谱的男性人口记载生卒程度可想而知。至于出嫁的女性人口更难做到收罗殆尽了。例如,常州过氏6世男性21人,生子25人,生女仅1人,不能不令人生疑。

另外,使用宗谱资料考察人口性别构成时,对宗族人口规模的有限性所带来的人口性别比极不平衡的现象应有所认识,有的宗族人口规模较小,一族之内可能出现极其严重的性别比不平衡,它的社会普遍意义怎么样呢?例如南通州徐氏11世男性2人,生子5人,未生女儿,很有可能,属于人口生育和社会正常现象,因而宗族内男性绝对增加女性绝对减少。嘉定练西黄氏“累世出生统计”,6世以前无女性人口出生,男性也少,可能性较大,或许这是事实。但由许多宗族人口聚合成的社会男女性人口比例就不会象徐氏、黄氏宗族那样显得如此特殊。

所以,宗谱人口性别构成问题的考察最好在男女性人口记载比较全面、人口规模较大、地域广泛

① 见《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5期。

② 《六修江苏洞庭安江里严氏族谱》叙例。

③⑤ 《海宁岩门高氏宗谱》序。

④ 《重修上虞通明钱氏宗谱》序例。

而宗族分布地域较为集中的宗谱内进行。本文考察的江南宗谱22部(见表1)。

22部宗谱的男女性人口总数据笔者统计共为45 516人。其中本族出生的女性占该宗族人口比例在33~44%之间的宗族有18个,男女性人口共计28 736人,女性人口占宗族人口的平均比例为38.76%,男性人口占61.24%。

毫无疑问,22个宗族人口性别构成很不平衡。究竟不平衡的程度如何,它们揭示的清代江南社会人口性别构成不平衡的程度如何呢,是否宗谱人口的各世代及其所反映的江南社会各个时期人口性别构成总是不平衡,还是出现了其它一些现象?我们暂且根据18个宗族、28 736人、女性占宗族人口33~44%、平均比例38.76%的基础略加研讨。

二 宗谱人口性别构成状况

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稳定值为105~106,或者104~107。我们计算的宗谱人口性别比,包括了每一世代刚出生的婴儿。婴儿死亡率按已知人口规律是很高的,出生婴儿中男性多于女性,死亡率也比女性高。随时间推移,各年龄组的男女比例渐趋平衡。到老年,女性便多于男性。由于宗谱世代性别比不易分清各年龄组的性别比,所以无法看清这一规律性变化。只得将一个宗族的活产婴儿至年迈古稀者都包括进去,观察其性别比平衡程度。

按照104~107的性别比稳定值,甚至适当放宽到110,仍然发现江南各宗族男女性别比严重不平衡。

总性别比失调大的宗族有江阴袁、常州过、镇江吴、通州徐、苏州叶、嘉定黄,共6个,都在170以上196.4以下。它们的女性人口总数只占本宗族人口的33.74~36.57%。宜兴吴和武进庄在160上

表1

宗谱男女数量和性别比

谱名	男子数	女子数	女占宗族人口%	性别比	世代	公元年
海宁高氏	9 299	325	3.38		17~26	1600~1853生
师桥沈氏	2 993	259	7.96		19~27	1574~1851生
蔚门陆氏	934	104	10.02		10~17	1638~1888生
茹墟徐氏	2 262	604	21.07		14~21	1588~1889生
澄江袁氏	1 991	1 014	33.74	196.4	15~26	1598~1949生
平江叶氏	2 280	1 204	34.56	189.4	11~23	1531~1934生
常州过氏	372	207	35.75	179.7	1~13	1522~1930生
练西黄氏	142	81	36.32	175.3	6~10	1732~1902生
通城徐氏	222	127	36.39	174.8	11~21	1611~1925生
润州吴氏	1 065	614	36.57	173.5	12~24	1554~1922生
宜兴吴氏	213	131	38.08	162.6	3~11	1591~1932生
毗陵庄氏	4 864	3 041	38.47	159.9	9~17	1577~1935生
会稽柳氏	580	415	41.71	139.8	1~13	1579~1925生
当湖张氏	691	499	41.93	138.5	19~29	1579~1913生
钱塘袁氏	195	142	42.14	137.3	10~20	1617~1922生
通明钱氏	1 825	1 331	42.17	137.1	25~35	1636~1916生
鹿山屠氏	1 695	1 243	42.31	136.4	9~18	1578~1897生
京江郭氏	851	627	42.42	135.7	6~15	1646~1901生
上海葛氏	267	199	42.70	134.2	2~10	明末~1907生
上海倪氏	103	77	42.78	133.8	1~11	明末~1926生
杭州汪氏	169	130	43.48	130	82~94	1579~1932生
虞山沈氏	72	57	44.19	126.3	1~8	明末~1909生
总计	33 085	12 431		157.98		1522~1949生

注:女子数均指本宗族出生的女性人口。

下,女性人口占宗族人口38%左右。其余10个宗族,女性占宗族人口41.71~44.19%,性别比多在130~140之间,只有常熟沈氏为126.3,是18个宗族中性别比失调程度最小的。

倘若女性人口记载基本完全,她们确实只占宗族人口41~44%,则清代江南人口性别比一般水平为130~140之间,男多女少,男性绝对过剩,不容置疑。倘若女性所占宗族人口41~44%的比率或多或少是由于宗谱记载失调而致,则清代江南人口性别比当在126.3以下,男女平衡的失调程度还应减小。

通计江南18个宗族男性人口总数17 597人,女性人口总数11 139人,性别比是157.98,出现严重不平衡。而各宗族每世代性别比也不平衡,一般男多女少。

但是,宗谱人口也有宗族某几代男女性别比平衡或接近平衡的现象。例如常熟沈氏4世性别比111,上海葛氏8世112,杭州汪氏92世107、93世100,通

州徐氏21世111, 镇江郭氏10世103, 镇江吴氏24世100, 常州过氏2世100, 苏州叶氏21世103、23世110, 平湖张氏24世111, 钱塘袁氏17世100, 会稽柳氏12世106, 上虞钱氏29世112。

更有甚者, 宗谱人口中宗族世代男女性别比出现女多男少, 女子绝对过剩的状况。例如常熟沈氏1世75, 5世78; 上海倪王氏6世78, 8世92, 10世94; 杭州汪氏89世88; 通州徐氏11世40; 镇江郭氏9世90; 江阴袁氏26世80; 钱塘袁氏11世78, 18世92, 20世60; 嵊县屠氏18世89; 宜兴吴氏6世74。这种现象表明上述宗谱记载的男女性数量已很详实, 这些宗族在对人口的搜集和记录中较少重男轻女意识。因而, 其统计结果是可信的。无论是男多女少、男女平衡或接近平衡, 还是男少女多的人口现象, 都确实在江南宗族中发生过。

18个江南宗族显示的人口性别构成的可靠性以及它反映的部分地区历史人口的真实存在, 还可以通过其它地区的宗谱人口的有关情况加以检测。

福建西清王氏明末避乱入闽, 安居闽县城东灯笼巷, 世代繁衍, 宗谱记载从9世始见女性人口, 到14世共183人, 同期男性350人, 女性占宗族人口34.33%, 性别比高达191.26, 与18个江南宗族相比, 并不算高, 与江阴袁氏196.4接近。

郭松义先生研究了全国22部宗谱人口性别比^①, 男女性人口总和为13 057人, 其中男性人口8 210人, 占总人口62.88%; 女性人口4 847人, 占总人口37.12%。女性人口在各宗族人口的比率为31.06~49.11%不等, 总平均性别比为169.38。由于有5个宗族的性别比在200以上(206~222), 导致了总平均性别比增高。如果我们只讨论其余的17个宗族人口性别比, 则和我们讨论的江南宗族人口性别比更带有一致性趋向。

17个宗族男女性总数9 878人, 其中男性为6 036人, 占61.11%, 女性人口3 842人, 占38.89%。各宗族女性人口占其总人口比率为33.41~49.11%。宗族人口性别比在104~199之间, 总平均为157.11。因宗族女性人口比重更大些, 故性别比比前述江南18个宗族的人口性别比略低, 但十分接近(38.89%: 38.76%, 157.11: 157.98), 同样男多女少, 性别比严重失调。

不过, 也有宗族人口性别比平衡的情形。例如云南腾冲李氏(10~19世)男性57人, 女性55人, 性别比104, 和江南宗族人口性别构成中出现的性

别比平衡或接近平衡现象一致。

郭松义先生研究的全国22个宗族的性别比最高222, 最低104, 高低均在笔者统计的江南18个宗族性别比之外。然而不少宗族的性别比十分相似。譬如浙江上虞钱氏(137.1)与钱塘袁氏(137.3), 浙江建德朱氏(189)与苏州叶氏(189.4), 江苏常州过氏(179.7)与四川崇阳王氏(180), 通州徐氏(174.8)与广东长乐郭氏(174), 河南西平陈氏(174), 江苏武进庄氏(159.9)与四川简阳游氏(160), 上海倪王氏(133.8)与山东泰安姚氏(133), 广东南溪盛氏(116)与江西南昌凤岐湖张氏(116)。总体上都是男多女少, 笔者与郭松义先生的研究在纯随机抽样统计比较下具有惊奇的同一性, 显示出清代江南与全国人口性别比失调, 人口性别构成畸形。这不能不说是清代人口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总之, 清代江南和全国许多宗族人口性别构成的抽样调查表明, 清代人口性别构成存在着严重的男多女少, 男性绝对过剩状况, 但也确实存在过男女性别比平衡或接近平衡, 甚至男少女多的现象。

此外, 从对宗谱人口性别比研究中发现, 清代江南及全国的性别比存在着地域差别。福建西清王氏(191.26)与江南18个宗族如江苏武进庄氏(159.9)、浙江上虞钱氏(137.1)相比, 就大不相同。即使同省同府州同县之内也有这种差别, 如江苏江阴袁氏(196.4)与宜兴吴氏(162.6), 浙江会稽柳氏(139.8)与杭州汪氏(130), 镇江府吴氏(173.5)与郭氏(135.7), 常州府过氏(179.7)与庄氏(159.9), 杭州府汪氏(130)与钱塘袁氏(137.3), 宜兴吴氏(162.6)与庄氏(157), 丹阳刘氏(210)与陈氏(198)。

城乡宗族的性别比同样有同有异。如上海城葛氏(134.2)与倪王氏(133.8), 镇江城吴氏(173.5)与通州城徐氏(174.8), 钱塘袁氏(137.3)与上虞通明乡钱氏(137.1)基本相似。杭州城汪氏(130)与钱塘袁氏(137.3), 江阴县城袁氏(196.4)与苏州叶氏(189.4), 嘉定黄氏(175.3)与宜兴吴氏(162.6)等均有一些差别。

因而, 我们研讨人口性别构成, 既应找出同一地域和不同地域的共同性, 又不能忽视同一地域和

^① 《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 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笔者对此文的一些数据根据需要进行重新作了计算。

不同地域的差异性,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并阐释人口和社会发展的纷繁表象。

三 清朝官方统计中的人口性别构

成与宗谱人口性别构成的关系

依据江南诸府县的清朝人口记录,凡是载有男女性人口数字的年份笔者一一作了统计,发现这些人口资料中的性别比具有以下特色:

(一)大多数男女性别比严重不平衡,男多女少。按时代划分,17世纪江南地区的官方统计中男女人口数字很少。绍兴府保留了“康熙籍”(公元1662~1722)年的性别比,竟高达227.8。康熙时(公元1662~1722年)余姚县为214.6,上虞县179.3。

18世纪江南人口性别比,官方反映稍微增多。1736~1792年昭文县130.9,1749年萧山县132.1;嘉兴府1769年138.3,1789年136.5,1799年135.7,起伏较平稳,各分县高低差异则较大,如海盐、平湖、桐乡很高,秀水、石门相对低些。

19世纪江南人口性别比,官方统计数字很多。1806年德清县121.97,1811年溧阳县122.3;1817年新城县150.9;1820年苏州府134.4;其中吴县155.2,长洲、元和、新阳、常熟、昭文、吴江、震泽诸县均超过113.4;崑县1820年为113.6,1821年为113.5;1822年新城县151.8;1826年江阳县136.4,1830年象山县117.5,1838年嘉兴府131.4;1864年吴江县121.4;1866年长兴县226.3,其中渔户仅有177.2;1869年崑县116.5;1872年乌程县大丁口性别比为125.6,小丁口性别比194,其男性多于女性的程度确实大大超过大丁口,符合人口规律,总性别比为142.8;孝丰县同年高达219.7;1873年嘉兴府134.2,1876年江阴县132.9,1878年昆山县116.2;新阳县127.6;常熟县135.3;1881年太仓州118.2;1887年嘉兴府122.2;1891年溧阳县为313.5;令人很难相信。1897年富阳县以富春江为界,江北三区性别比119.6,江南三区126.2,可见同县也有区域差别。宜兴县光绪、宣统时(公元1875~1911年)性别比是191.3,其中渔户只有114.2,由于他们是专业户,统计相对较精确。

20世纪初的清朝人口性别构成统计数字在时间上更为缩短。1900年临安县性别比为117.1,1904年112.7,1908年110.7;1910年崇明县124.9,吴县150,萧山县110.16,1911年萧山县仍是110.24。

(二)存在男女性别比平衡状态。1810年上海县统计历年滋生男女比为105,1820年昆山县100.9,

1838年嘉兴县104.6,1874年南汇县105.4,1910年萧山县分区性别比24个乡中有9个乡在101.97~104.18之间。

(三)存在男少女多不平衡现象。1744年震泽县总性别比为82.3,分区则城区为80.4、平望镇78.6、震泽镇86.8。1879年崇明县98.8。1910年长洲县仅57.6,元和12.7,很不属实,但男性人数不一定会超过女性人数。

以上清朝官方统计中呈现的人口性别构成的三种形态,在宗谱人口性别构成中都有存在,而且都是第2、3种现象少,第1种现象占绝大多数。这两种资料系统在不同的对象与认识程度上形成,却显示了人口性别构成形态的共同性。由此可以表明,研究更为具体可信的宗谱人口性别构成,能够用来把握清朝官方统计资料中人口性别构成状况。这种研究揭示出,清朝官方统计资料中人口性别构成的趋势和现象有一定真实可信之处;而经过选择和鉴别的清朝官方统计中人口的性别构成,与宗谱人口的性别构成相比较所出现的共同趋势和具体现象,可以反证宗谱人口性别构成状况的可信度。探讨清朝官方人口性别构成与宗谱人口性别构成的关系利于探讨清代江南地区人口性别构成问题。

宗谱人口性别构成的探讨,还能揭示清代全国人口性别构成状态。例如,1910年全国人口调查结果表明,全国男女性别比为121.70;北京最高,达199.5;江苏119.2;浙江121.3^①。江南18个宗族中男女性别比最高为196.4,与北京相似,而最低为126.3,则与本区域的江苏、浙江,尤其是浙江的性别比极其相似。

本文的主要意图在于弄清清代江南地区人口性别构成状况。这些地区的宗谱资料可以告诉我们清代江南地区以至全国人口性别构成的真实状况,男女性别比的平衡程度;宗谱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清朝官方统计中人口(丁口)性别比的可信性,可以加深历史人口研究。但是,对宗谱人口性别构成现象的阐释,寻找男女性别比如此悬殊的根源,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文引用宗谱

《徐氏通城支谱》(1932)《润州吴氏家乘》(1922)

《京江郭氏家乘》(1911)

(下转第60页)

^① 《中国人口地理》上册,145~146页。

66.2%；政策不允许的有33.8%，主要是多胎。政策不允许，计划生育部门也未加强管理所生育的比例为26.5%；而有7.3%的多胎生育属于计划生育部门没管住，自己强行生育的结果。说明这一阶段计划生育管理还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在强化政策的1980~1984年间，生育二胎以上的有78.4%，都是政策允许的。即使剩下的21.6%属于政策不允许而强行生育的，计划生育部门也都曾出面干预过。这说明，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抓的是比较紧的，不仅能及时发现问题而且能尽量解决问题，而问题没有解决的关键还是有些人生育多胎的愿望过于强烈，不服从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所致。这些不服从管理而强行生育的人中，有13.7%的人是在当地生的，只有3.9%的人是跑到外地生的。表明为逃避计划生育而外出生育的人并不多。1985年以后由于政策放宽了，从而符合政策的比例自然要提高，达到87.6%，有10.4%的生育是不符合政策的，这其中有8.7%计划生育部门作了工作，但未收效，1.7%根本没有管，这很可能是由于政策多变，挫伤了基层计生干部积极性所致。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辽宁省黑山县生育状况可以大体反映辽宁省的一般水平。该县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这种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和要求，可以说当地妇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这里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追求现代的生活方式，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已经在“发展”的道路上行进。正象当地农民所讲的那样：“过去家庭所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改革以来这个

问题任何家庭都不存在了，我们想的只是怎样能生活得更好”。在中国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孩子的增加只是多了一双筷子的问题，并不影响全家人的吃饭问题。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精神享受，孩子的多少对此有很大的影响。在利与弊的权衡上，人们开始选择少生孩子。

黑山县不仅客观条件好，而且计划生育工作也走在前列。该县多次被评为全国和省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各级领导对计划生育工作十分重视，各种宣传标语随处可见。近年来，当地计划生育协会在计划生育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涌现出不少的好人好事。这些都对该县的计划生育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该县的计划生育工作效果是很明显的，与国家生育政策的要求完全一致。在计划生育政策转变的每一个阶段上该县都能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去做，不仅完成了国家的计划要求，而且成绩十分显著，如果提倡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该县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不仅工作越做越好；只生一个孩子的最终目标也会实现，这同全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在调查中与当地女孩的交谈中发现，她们自觉地不生二胎，而且能说出很多不要二胎的具体理由。这是我们调查前不曾想到的，而实际情况正象她们所说的那样，当地生一胎比重相当大，而二胎以上的比重却很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计划生育效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当地计划生育工作的好坏，还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取决于当地是否在客观上存在限制生育的机制。（本文责任编辑：张京华）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

（上接第48页）

《锡山过氏浒塘派迁常支谱》(1930)《毗陵庄氏族谱》(1935)《澄江袁氏宗谱》(1949)《虞山沈氏宗谱》(1911)《上海葛氏家谱》(1928)《上海倪王氏家乘》(1927)《六修江苏洞庭安仁里严氏族谱》(1933)《陆氏葑门支谱》(1888)《吴氏宗谱》(1934)《平江叶氏族谱》(1935)《练西黄氏宗谱》(1915)《当湖张氏家乘》(1914)《海宁

岩门高氏家谱》(1853)《汪氏振绮堂宗谱》(1930)《钱塘袁氏宗谱》(1934)《会稽张家沥柳氏宗谱》(1925)《重修上虞通明钱氏宗谱》(1916)《余姚茹墟徐氏宗谱》(1899)《师桥沈氏宗谱》(1951)《嵊县鹿山屠氏宗谱》(1897)《西清王氏重刊族谱》(1972)

（本文责任编辑 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大学历史系）

（上接第62页）因此笔者认为，虽然解放后中国的人口质量提高较快，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高，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要提高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键不在于提高表面上的人口质量存量，而在于提高人口质量的“质量”（就教育而言，一是结构调整，二是提高教育质量）和理顺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改革现行体制中不合理部分。这便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本文责任编辑：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